

# 帝国时代的罪与罚： 夏目漱石的救赎之“门”

邱雅芬

**内容提要** 夏目漱石的《门》是由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共同建构起来的勾绘日本殖民扩张时代之“罪恶”与“救赎”的文本。有关宗助夫妇的“个人叙事”构成明线，“国家叙事”构成暗线，明暗双线共同指向罪恶与救赎的主题。从《论语》、《菜根谭》、《碧岩录》等中国传统儒释道经典中，夏目漱石寻求着“救赎”之路，尤其表现出对禅宗的浓厚兴趣。

**关键词** 夏目漱石 《门》 《论语》 《菜根谭》 《碧岩录》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亚地区迅速崛起。明治时代（1868—1912）被日本人称为“伟大的时代”，而素有“明治文豪”之称的“国民作家”夏目漱石（1867—1916）在1905年元旦之际以38岁之龄登上日本文坛。其时，日俄战场战事正酣，夏目漱石文学由此深深地刻上了“日俄战争”的烙印。柴田胜二指出“漱石在明治38年[1905]1月日俄战争期间，以《我是猫》开启作家生涯，其后作品均以主人公及其人际关系为依托，描写这场大战后出现的种种物质及精神问题。”<sup>①</sup>另一方面，诞生于世纪之交时代裂变之际的夏目漱石文学亦注定内含诸多的矛盾，例如水川隆夫就夏目漱石兼有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倾向指出：

漱石从学生时代至晚年，从不盲信一时的国策或大众传媒论调，他坚持着自己的头脑思考并做出判断的“个人主义”思想和态度。而且，他对

---

<sup>①</sup> 柴田胜二『村上春樹と夏目漱石 二人の国民作家が描いた〈日本〉』，東京：祥伝社，2011年，第4頁。

战争带来的悲剧、战争的原因与责任、日俄战后的内外政策、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问题都留下了卓越的见地。

另一方面，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大众传媒信息的不足与过剩、当时日本社会科学研究等尚不发达以及受制于亦渗入其自身内部的“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等原因，他有时也会有不适宜的判断或表述（《从军行》、《满韩漫游》等）。但他对照现实，不断反省自己过往的判断或表述，通过自我批判进行修正，其战争观由是不断深化。在最后期的《点头录》中，他几乎克服了其自身内部排外的国家主义。<sup>①</sup>

夏目漱石的随笔《点头录》分九次刊载于1916年1月1日至21日的《朝日新闻》，而他于当年12月去世，可见与“其自身内部排外的国家主义”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几乎贯穿了夏目漱石的整个创作生涯。这种“国家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不仅与当时日本社会的大环境有关，亦与夏目漱石留学英国时代的屈辱记忆不无干系。他在《文学论》中写道“生活在伦敦的两年是最不愉快的两年。我在英国绅士中间，仿佛狼群中的一条卷毛狗，过着凄惨的日子。”<sup>②</sup>这种苦涩的体验导向某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怀亦是自然之事。

夏目漱石从14岁开始接受汉学熏习，一生热爱汉诗文，存有二百余首汉诗，而大学时代主攻英文，后任英语教师，并于1900年留学英国两年，具有转型期文化人的诸多特质，这是其文学内含诸多矛盾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作为“西化”的明治时代的代表性作家，夏目漱石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汉文学资源，创作于1910年的小说《门》即属于这类文本。在《门》中，夏目漱石探究如何通过儒家、佛家伦理匡正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亦为传统经典注入了时代气息。《门》由国家叙事和个人叙事明暗双线交织而成，不仅呈现了夏目漱石矛盾纠结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底色，而且依靠作家的汉文学素养，展现了通过儒家伦理和佛家伦理寻求救赎的路径。

## 一、帝国时代的罪与罚

《门》于1910年3月1日至6月12日连载于《朝日新闻》，是夏目漱石早期

<sup>①</sup> 水川隆夫『夏目漱石と戦争』，東京：平凡社，2010年，第273-274頁。

<sup>②</sup> 夏目漱石『文学論』（上），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第24頁。

三部曲中的第三部<sup>①</sup>，描写普通公务员野中宗助与其妻阿米这对恩爱夫妻的日常生活。这对夫妻夫唱妇随，却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在与宗助结婚前，阿米是宗助朋友安井的同居女友，宗助与阿米的婚姻始于对友情和爱情的双重背叛，安井在极度痛苦中远走满洲。宗助夫妻亦众叛亲离，在多年的漂泊后，离群索居于东京一处阴暗孤寂的寓所里，过着恬淡而窘迫的日子，并忍受着命运的诸多诅咒。在极度苦闷中，宗助最终决定到禅寺体验短期参禅，以摸索彻底摆脱痛苦的可能性。关于该作品的评价，评论家濑沼茂树指出：

一方面，在描写平凡小市民悲惨的家庭生活的同时，还描写了由夫妇之爱带来的满足与和睦的喜悦之情——理想的小市民之爱；另一方面，则描写了堕入罪恶意识中，虽然寻求救赎却没有任何救赎可能性而陷入精神地狱的“迷茫者”形象。许多评论家由于这二者之间的不协调，都从不同立场出发，指出了作品的缺陷。严格而言，如将重点放在前者，也许会像正宗白鸟那样，认为后来的参禅“有点开玩笑的意味”，对“不自然的伏笔”生厌。而关于后者，片冈良一等均指出罪恶意识的设定问题颇多。我经过认真思考，亦认为该作品即便并非如白鸟或良一等所言，但亦必须承认其缺陷。<sup>②</sup>

这是长期以来对这一作品较为典型的评价方式，即大多数评论者认为小说描写了宗助夫妻的爱与罪，但这两种情感之间缺乏必然性，故作品存在明显的“缺陷”。然而，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作家由此开始将创作视角逐渐内敛，挖掘人物内面世界，深化伦理拷问力度，“缺陷说”并不足为信。第一套夏目漱石全集编撰工作的重要参与人、夏目漱石的门生小宫丰隆指出：“《门》在夏目漱石的作品中，无论在思想深度方面，还是在承上启下方面，都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作品。”<sup>③</sup>吉本隆明则说自己于“漱石作品中最喜爱《门》”<sup>④</sup>。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尝试新的阐释方式，例如冈本直茂便以宗助的参禅体验为切入点，聚焦作品中的宗教情结，认为这是一部“求道小说”，指出“《门》是一对追求

① 早期三部曲为《三四郎》（1908）、《其后》（1909）和《门》。

② 濑沼茂树「『門』」，收入『文芸読本 夏目漱石Ⅱ』，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81年，第64頁。

③ 小宮豊隆「『三四郎』『それから』『門』解説」，收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四卷『三四郎 それから 門』，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第904頁。

④ 吉本隆明『夏目漱石を読む』，東京：筑摩書房，2017年，第280頁。

爱的夫妇向上天控诉无情命运的故事，根底里是作者的求道心。‘门’前的宗助的身影表达了作者漱石的求真之心，仿佛《旧约圣经》之《约伯记》中的约伯。宗助到‘门’之前，唯有彷徨”<sup>①</sup>。笔者认为，该作品不仅是关乎宗助夫妇的“个人叙事”，更是关乎时代的“国家叙事”。虽然小森阳一等学者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国家叙事问题，指出“可知小说内含着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殖民地主义这些具有鲜明的同时代色彩的课题”<sup>②</sup>，但提出类似观点的学者大多忽略了作家着力刻画的与之相关的“救赎”主题。

从表象看，《门》主要以宗助夫妇位于东京一隅的阴暗孤寂的寓所为舞台，但实际空间更为广阔。阿米的前男友安井远走满洲；宗助房东的弟弟亦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为赚大钱去了那里，后因生意失败，又从满洲“流落”到蒙古；宗助的弟弟小六也打算如果筹不到学费，则“退了学，索性现在就去满洲或朝鲜”<sup>③</sup>；而把故事情节推向高潮、把宗助推向“山门”的力量亦来自满洲：当房东无意间提及安井或许将从满洲回来时，宗助的不安达到极限，他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奔向寺院“山门”，以寻求彻底摆脱痛苦之路。可见，由岁月推移、季节变换的“时间轴”串起的“个人叙事”背后，还隐藏着由满洲、朝鲜这些“空间”概念所象征的当时日本的诸多特征，如日俄战争、帝国、殖民、掠夺等等，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国家叙事”。因此，《门》是由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共同建构起的日本殖民扩张时代“罪恶”与“救赎”的文本，其中，有关宗助夫妇的“个人叙事”构成明线，“国家叙事”构成暗线，明暗双线共同指向“罪恶与救赎”的主题，显示了夏目漱石卓越的叙事能力及介入时代话题的热情。

需要指出的是，个人叙事是主线，国家叙事是辅线。主线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推手，所以读者们对宗助夫妇恬淡而窘迫的家庭生活了如指掌；辅线则隐藏在主线的之下，一般不直接推动情节发展，却不动声色地影响着作品人物，并在关键时刻直接介入故事进程，将故事情节一举推向高潮。对主人公宗助而言，远在满洲的安井仿佛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毁灭其家庭生活；

---

① 岡本直茂「夏目漱石『門』論『求道小説』としての読み」，載関西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千里山文学論集』2014年3月号，第101頁。

② 久保希梨子「小森陽一氏講演会 夏目漱石『門』における満州と朝鮮」，載 *Journal of the Asia-Pacific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2015年3月号，第59頁。

③ 夏目漱石『門』，收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四卷『三四郎 それから 門』，第648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門』”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换言之，暗线看似不动声色，却暗流涌动，构成了明线庞大的时空背景，其中隐含着夏目漱石对日本殖民地问题的反思。夏目漱石之所以采用暗线形式建构其殖民地言说，应与当时日本严格的审查制度有关。日俄战争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开始流行，其反抗传统家族体制的叙事方式极具破坏力，日本政府遂进一步强化了出版物审查制度。在官民一致沉醉于殖民扩张的狂热中时，任何反思殖民地问题的言说都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夏目漱石通过暗线形式进行隐晦叙述的重要原因。

1889年2月11日，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保证日本军队不受政府和议会的干涉，为日本进行军国主义扩张扫清了障碍。该宪法一直实施至二战战败，在此期间日本自称“大日本帝国”，“掠夺”成为帝国时代的最强音，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上至国家，下至庶民百姓，均开启了只顾满足私欲而罔顾他者感受的“掠夺”模式。《门》便形象地展示了这种“掠夺”的行径及其后果，“掠夺”也因此成为连贯《门》之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重要线索。具体而言，主人公宗助从安井那里“夺取”了阿米，日本国则在“夺取”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台湾之后，又将魔爪伸向了朝鲜半岛及我国东北地区。

作品中以“掠夺”为关键词的日俄战争、日韩合并、帝国、殖民等“国家叙事”多采用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并通过暗线形式呈现出来。作品第十四部分开篇写道“宗助和阿米无疑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夫妇。两人生活在一起，至今大约有六年之久了。”（『門』：774）如前所述，《门》于1910年3月起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以“六年之久”推算，宗助夫妇开始共同生活大致始于1904年初，即与日俄战争（1904年2月—1905年9月）爆发的时间点重叠；而“六年”的时间设置则将文本内时间大致框定在1904至1910年之间，与此相应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日俄战争及日本侵吞朝鲜的“日韩合并”。《门》的特点之一是拥有显见明晰的“时间轴”，整个故事始于秋季，终于春季，顺时铺陈，展现了一幅阴郁的四季绘卷；那么，“六年”的时间设置也隐含了深刻的“国家叙事”内涵，承载着作家的殖民地言说。

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及朝鲜的殖民地及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位于我国领土及附近海域。明治维新后，日本采取强兵富国政策以谋求崛起，其早期侵略路径是希望通过控制朝鲜进而占有我国东北，最后霸占整个中国。也就是说，其最大的侵略目标是中国，而朝鲜是达成其目标的跳板。日俄战争中，日本以小胜大，战后霸占了辽东半岛，不仅为实现其

在我国东北的殖民扩张政策开辟了道路，还依靠“满铁”大肆掠夺我国财富。<sup>①</sup>作品第七部分提及与宗助夫妇同住一个院子的本田夫妇过着优哉游哉的养老生活，“老夫妇有一个儿子，在朝鲜的统监府之类的部门做官，靠着每月寄来的赡养费，老夫妇生活得很宽裕”（『門』：703）。本田夫妇靠着来自朝鲜的汇款得以颐养天年，可知在日俄战争后不久，日本殖民掠夺的红利已相当丰厚。

作品第三部分，小六到兄嫂家打听自己的学费问题，期间聊到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刺事件。于是，阿米问小六“为什么被刺杀呢？”这也是阿米看到号外时向宗助提出过的问题，但小六答非所问“手枪砰砰地连发之后，命中了。”阿米紧追不舍，“可我是问为什么被刺杀”，“小六露出不得要领的表情”（详见『門』：644）。可见宗助和小六都不能有效回答阿米的提问。伊藤博文是日本政治家，明治元老之一，也是日本第一位内阁总理大臣，曾经四次组阁，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905年11月，伊藤博文以武力威逼朝鲜签订第二次《日朝协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设“统监”，朝鲜外交由日本外务省掌握，伊藤博文出任首任统监，掌控了朝鲜实权。1907年7月，伊藤博文又强迫朝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规定朝鲜的一切法令、内政等重大措施及高官任免均须经日本统监批准，在备忘录中还规定朝鲜解散军队，重要官员均由日本人担任。有了伊藤博文的经营基础，“1910年6月3日，日本桂太郎内阁决定吞并朝鲜。8月22日，日军以刀枪包围，逼迫朝鲜国王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朝鲜”（《日》：266）。面对国家危难，朝鲜独立运动家安重根于1909年10月26日在中国哈尔滨火车站射杀伊藤博文，被当场逮捕，并于翌年3月26日在旅顺就义。柴田胜二指出，《门》中安之助、安井名字中的“安”字应均与安重根之名有关。<sup>②</sup>

夏目漱石对满洲、朝鲜等地的关注与其满韩旅行密切相关。1909年9月初至10月中旬，他应大学预科时代的好友、时任满铁总裁的中村是公之邀，游历了大连、旅顺、熊岳城、营口、汤岗子、奉天、抚顺、长春、哈尔滨等地，接着又游历了朝鲜半岛，整个行程得到了满铁及满铁总裁的高规格接待。换言之，在创

---

<sup>①</sup> 1906年6月，日本决定设立南满洲铁道公司，简称“满铁”，这一对华扩张的重要战略设施不仅实行经济掠夺，还设有调查部，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为霸占中国提供智囊服务。“日本正是视‘满铁’为‘恢宏皇猷的生命线。’‘满铁’作为日本侵华的特殊机构，疯狂地攫取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1907—1931年，‘满铁’付给日本政府、股东的红利、公司债利息和公债金等4项共8.3亿日元‘满铁’完全是一条殖民主义的吸血线。”（赵建民、刘予苇《日本通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第268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简称“《日》”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sup>②</sup> 详见柴田胜二『漱石の中の〈帝国〉国民作家と近代日本』，東京：翰林書房，2006年，第155-156頁。

作《门》之前，夏目漱石刚刚实地考察了“满铁”及满洲、朝鲜，在当地触及了日本殖民机构的一些核心部分。返回日本后，从10月21日开始，夏目漱石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满韩漫游》，但仅涉及满洲还未及朝鲜，写作便半途而废。这一方面应与10月26日伊藤博文被杀事件大量占用报刊版面有关，另一方面，刚刚接待过夏目漱石的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当时也在事发现场，但未被击中，而夏目漱石本人也刚刚游历过哈尔滨火车站，可以说他几乎“亲历”了这一反殖民事件，巨大冲击下停笔算事出有因。“从《满韩漫游》中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对于满洲的认识是复杂的，甚至流露出恐惧的情绪。惨烈的日俄战争留下的废墟还没有清理，旅顺口海底的沉船和鱼雷依然存在，围绕‘鬼屋’的战争创伤故事不断流传……夏目漱石不愧是二十世纪的预言家，他也许已经预见到日本会陷入满洲殖民地的泥沼，最后会遭到历史的惩罚。按这样的逻辑推理，《满韩漫游》的辍笔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sup>①</sup>

《门》是夏目漱石于《满韩漫游》辍笔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其中或许承载着游记未竟的记录或反思。作者通过都市隐士般的宗助夫妇的日常生活，凸显出作品人物与国家、社会之间强烈的“疏离感”，完全褪去了《满韩漫游》的“东方主义色彩”<sup>②</sup>。《门》连载期间，还发生了震惊日本的“大逆事件”。1910年5月，明治政府以谋杀天皇的“大逆罪”为借口，逮捕了幸德秋水等一大批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最终于翌年年初判处12人死刑，并由此建立“特别高等警察”以监视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日本社会，“甚至连《昆虫社会》这样的书也因为‘社会’二字而遭抄没”（《日》：262）。就这样，《门》表面上描写了宗助夫妇的日常生活抑或他们的爱与罪，实则隐含着庞大的“国家叙事”，它以1904至1910年即日俄战争至日韩合并的日本殖民扩张时期为时代背景，呈现了日本帝国掠夺一切的“殖民欲望”，而这种极度膨胀的欲望是一种将会遭受惩罚的罪恶。

以“掠夺”切入“罪恶”的叙述方式也与夏目漱石深厚的佛学修养有关。佛教有“三毒”之说，即认为“贪嗔痴”三毒是人类恶行的根源，而“贪”，即“贪欲”，为三毒之首。<sup>③</sup>夏目漱石深刻地预见了一种贪得无厌的掠夺必将招致严

<sup>①</sup> 王成《夏目漱石的满洲游记（译者序）》，收入小林爱雄、夏目漱石《中国印象记 满韩漫游》，李炜、王成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151页。

<sup>②</sup> 小林爱雄、夏目漱石《中国印象记 满韩漫游》，第141页。

<sup>③</sup> 详见陈兵编著《新编佛教辞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酷的惩罚，宗助夫妇窘迫的生活境遇以及伊藤博文被杀事件便是明证。作为明治日本的知识精英，在整体“西化”的时代浪潮中，夏目漱石超越性地回望东方传统，希望从儒家、佛家传统中寻求精神救赎的可能性，以抵御失控的欲望，缓解罪与罚带来的创伤与苦痛。

## 二、“子路”所象征的儒家救赎路径

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夏目漱石于1911年8月在和歌山进行了一场题为《现代日本的开化》的讲演，指出“一般日本人并不明白〔现代日本的开化<sup>①</sup>〕这个问题”，“西方的开化是内发型的，日本现代的开化是外发型的。内发型是指从内部自然生发，正如花朵开放般，花蕾破绽怒放。而外发型是指迫于强大的外力，不得已而为之”，“一言以蔽之，现代日本的开化是流于表面的，肤浅的”，演讲接近尾声，他还以超越时代的洞察力预言了现代性对个人造成的压迫，说“我们在骄傲于这叹为观止的知识的收获的同时，还将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奄奄一息地呻吟于路旁，这是必将发生的现象”。<sup>②</sup>

新的明治时代是一个在诸多方面与传统决裂的时代，也是一个拜金主义盛行的忙碌的时代。关于当时的“忙碌”状况，从宗助对星期天的期盼即可得知：“平时忙碌不堪……但七天一次休息日到来，心可以放松一下时，便觉得平时的生活是多么仓促而轻浮。”（『門』：63）“七天一休息”的作息方式是明治日本导入的西式“时间机制”。《门》中还点缀了大量象征新时代的符号，如作品第二部分描写宗助在休息日到市区散步的情景，通过宗助的视角展示了当时东京的“都市”街景：电车、车内广告、街上“玻璃橱窗里漂亮陈列”着的“西洋书籍”，其中有本叫“*History of Gambling*（《赌博史》）”的书，装帧得特别精美，摆放在正中央、钟表店的“金表”和“金表链”、洋伞店、洋货店店头的礼帽和领带、绸缎店、刺绣精美的女式衬领……这些无不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杂志店前“新刊书目的大字广告”亦透露着“大众传媒”及“知识消费阶层”的兴起。可以说，这是一个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以金钱和消费欲望为价值导向的时代。

---

① 明治时代的日本将现代化称为“文明开化”或“开化”。

② 夏目漱石「現代日本の開化」，收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十一卷『評論 雜篇』，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第321、333、340-341頁。



新旧时代裂变的“历史感”还通过宗助对“东京”和“京都”这两座新旧都城的比较进行了描述。宗助曾经“满脑子都是时尚”（『門』：776），他考入京都大学，常和安井一起游览古都，但很快便觉得“这陈旧落后的地方令人感到乏味”，因为“当时宗助的眼里只有新世界……认为生活着的现在和即将到来的未来才是重要的，而正在消失的过去则是梦境般没有价值的幻影罢了。他看过许多凋敝的神社和凄凉的寺院，已失去把自己年轻的脑袋转向褪了色的历史的勇气”（『門』：778）；而学期结束返回东京时，东京的“炎热和煤烟”都令他感到“喜悦”，发自内心地用“壮美”二字赞叹东京（详见『門』：778-780）。

在如此的历史转折时期，祖传的艺术品也只能落得被变卖的命运。阿米变卖家中屏风，为宗助置办新鞋等物，“宗助觉得未尝不可，但将父辈留传下来的有抱一手笔的屏风为一方，把新鞋和新绸缎为另一方，不禁觉得这二者的交换是多么离奇而滑稽”（『門』：700）。“抱一”即酒井抱一，是江户后期著名画家，37岁时在京都西本愿寺出家，代表作有《夏秋草图屏风》、《四季花鸟图屏风》等。抱一画的屏风是艺术品，亦是传统价值观的象征，但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它只能变卖为“实用”的新鞋和新绸缎，宗助虽然感到“离奇而滑稽”，却也无可奈何。与此同时，传统的人际关系同样几近崩塌。宗助夫妇的共同生活便始于对安井的背叛。宗助的叔父亦将变卖其兄房产所得的大部分现金据为己有，致使原本富家出生的小六有可能上不了大学。叔父去世后，“佐伯婶母和〔其子〕安之助后来再也来过宗助家。宗助原本就无暇去麴町，而且也没有那种兴致。虽说是亲戚，却过着毫无干系的生活”（『門』：736）。可见人情之淡薄，传统人际关系岌岌可危。

宗助夫妇受到命运的惩罚，生活拮据。宗助未老先衰，阿米则经受了三次流产、死产的打击，身心俱疲。在极度痛苦中，阿米“终于迈进了某算命先生的门”，算命先生断言“你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你的罪过受到报应，你绝不会有孩子。”（『門』：773）“社会毫不客气地让他俩背上了道义的罪名……他俩抛弃了双亲，抛弃了亲戚，抛弃了朋友。说得笼统一点，他们抛弃了整个社会，抑或被抛弃了。学校自然也抛弃了他，不过表面上是自动退学。”（『門』：794-795）一连串的苦难令宗助开始回望东方传统，《论语》便成为其苦难中的精神源泉之一。

宗助并非爱读书的人，他“中途辍学后几乎没读过什么书，所以学问不如一般人”（『門』：747），但他还是为自己保留了一间“书房”（『門』：690）。他虽

然“不常进”书房，但书房空间的设置却透露出其意识中还有一方精神世界，这也是他能够安贫乐道的原因。在小说开篇处，夏目漱石写道：

宗助刚才把坐垫搬到套廊上，在向阳处舒适地盘腿坐了一会儿，不久丢开手里的杂志，一骨碌躺了下来。天气好极了，可谓秋高气爽。这一带安静之极，所以街上行人走过时的木屐声清晰可闻。宗助曲肱为枕，眼睛掠过屋檐仰望上空，碧空如洗。与自己躺着的局促的套廊相比，天空非常广阔。碰上星期天，能够如此尽情地眺望天空，宗助觉得别有一番情趣……两三分钟后，妻子朝拉门上的玻璃望去，只见睡在套廊上的丈夫不知打的什么主意，屈着双膝，身子缩得像一只虾，而且两臂交叉，把黑脑袋埋在臂间，根本看不到脸。（『門』：625-626）

此时的宗助已不再“满脑子都是时尚”了，他享受着秋日的阳光和宁静，觉得“能够如此尽情地眺望天空”是一件惬意事。作者将“局促的套廊”与“广阔的天空”相比，凸显了“天空”所象征的超然之美，而“局促的套廊”又何尝不是逼仄而充满了“殖民欲望”的帝国日本的象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宗助仰望天空时“曲肱为枕”的身姿，即阿米所见“屈着双膝，身子缩得像一只虾”似的身姿，无疑典出《论语·述而》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在长达六年的磨砺中，宗助发生了深刻的蜕变，这其中《论语》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宗助夫妇专门选了“离大街最远，也就多了几分闲静”（『門』：625）的地方住下，在清苦的日常生活中也能彼此恩爱，颇有《论语·雍也》之“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与此相呼应，宗助家后面崖上的粗毛竹挺拔屹立，竹影婆娑（详见『門』：629），也可见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竹子”所象征的“君子”精神的礼赞。事实上，《论语》便一以贯之地阐释了“君子”的风范。不仅如此，“竹子”与“闲静”所营造出的恬淡美亦是中国文人喜爱的诗题，如柳宗元在《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中写道“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宗助夫妇的居家环境及内心世界与这首柳诗的境界颇多相通之处，而柳宗元是夏目漱石深为喜爱的中国文人之一。<sup>①</sup>

<sup>①</sup> 这由《我是猫》中关于柳宗元的言说可知（详见夏目漱石『吾輩は猫である』，收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第321頁）。

《门》共三次直接提及《论语》。第五部分描写宗助夫妇谈及小六学费这件烦心事，宗助“走进了不常进的书房”，临睡前他告诉妻子：“今晚读了好久没读的《论语》。”妻子反问“《论语》说些什么？”宗助回答“哦，什么也没有。”（详见『門』：691）要向阿米说明《论语》的内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但从上下文的语境可知《论语》对宗助而言具有疗愈之用。第六部分仍是聊及小六时，阿米担心小六至今未接纳她这个嫂子，宗助安慰她“别管小六怎么想，只要我在。”阿米开玩笑道“《论语》是这么写的？”宗助回答“嗯，是这么写的。”（详见『門』：695）第十六部分描写宗助听“房东聊起昨晚在饭馆见到一位有点特别的艺妓”，“说是这位艺妓喜爱袖珍本《论语》，无论乘火车还是出去游玩，总把它带在身边”，“她说在孔子的门人中，她最喜欢子路，问她原因，说是子路这个男人非常正直，他在学了一种知识而未付诸实践、却又听闻新知识时，会引以为苦事”（『門』：806）。

子路名仲由，是孔门十哲之一，仅年少孔子九岁。他是《论语》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孔门弟子，擅长政事、直言敢谏、知行合一、重视友情，还是二十四孝“负米奉亲”中的孝子。艺妓所言子路性格典出《论语·公冶长篇》之“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由此可知子路是一位脚踏实地、知行合一的人。子路重视循序渐进的学习次第，这显然有违当时日本的急速膨胀或扩张理念。自甲午战争之后，有关日本的膨胀话题时常见诸日本报刊或书籍，如德富苏峰在1894年10月3日《国民之友》上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一文，而后又出版了《大日本膨胀论》（民友社，1894）一书，积极宣扬日本“膨胀”的必要性。德富苏峰是当时统领日本舆论的著名评论家，其言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门》推举子路的“正直”，暗含了夏目漱石的社会批判意识。

《公冶长篇》还记载了孔子所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而当孔子问子路志向时，子路回答“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可见其忠勇豪侠之气，这在“人情淡薄”的明治时代无疑是渐行渐远的美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人际关系几近崩塌之际，作者让一位艺妓对《论语》爱不释手，并让她赞美“正直”的子路，更加凸显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道德滑坡。

在上世纪之交日本崛起之时，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被不断膨胀的欲望牵引着，宗助夫妇当初亦是如此。夏目漱石希望以《论语》中安贫乐道、君子知命等思想抵御失控的“欲望”，以“子路”的美德呼唤伦理的重构。然而，《论语》

及“子路”所象征的儒家救赎路径并非所向披靡，当遭遇“非日常性”的冲击时，平静的“日常”有可能在顷刻之间彻底崩塌。对国家，对个人，莫不过如此。当宗助听闻安井即将返回的消息时，便体验了这种令人绝望的崩塌感，于是更为深刻的救赎成为绝望中的一线希望，这是宗助终于奔向“山门”的原因所在。

### 三、《菜根谭》引领下的佛家救赎路径

《菜根谭》是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结晶，是囊括了中国处世智慧的箴言录，它以心学、禅学为核心，兼及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无为。该书在日本被誉为奇书，自1822年首次印刷以来，各时代均有注释版问世，是日本现代企业界修身养性的必读书。从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漱石文库目录》可知，夏目漱石藏书中有二册版《菜根谭》。在小说《草枕》（1906）第三章，夏目漱石写道“我仰卧着……却也清晰地读出‘竹影拂阶尘不动’的字样。”<sup>①</sup>其中“竹影拂阶尘不动”便引自《菜根谭》下卷第六十三“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

《论语》是支撑宗助淡然面对苦难的精神源泉，而“怀着身处山里的心境，居住在都市里”（『門』：774）的隐士般的宗助夫妇使得《门》从整体上散发出寂静、恬淡的氛围，这与《菜根谭》崇尚的“静中真境，淡中本然”<sup>②</sup>的境界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可见作者希望用“菜根”所象征的朴素淡泊来抵御无限膨胀的“欲望”，宗助夫妇由是承受住了命运的严惩。虽然安井即将返回的消息令宗助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但他还是选择“挺起胸来生活下去”，在一位“上下班时，在电车中把西服口袋里的《菜根谭》拿出来阅读”的同事友人的介绍下，“走进了山门”短期参禅（详见『門』：825）。

“山门”即寺院的正门，亦常代指寺院，过去寺院多建在山林，故名“山门”。寺院一般有三个门，寓意“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所以又称“三门”。宗助在寺院受到青年僧侣释宜道的接待，并从师僧处领了“父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的话头。宗助不明就里，但大致知道“无非是让你把握自己的本质究竟为何物”（详见『門』：832-833）。在

<sup>①</sup> 夏目漱石『草枕』，收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二卷『短篇小说集』，东京：岩波书店，1984年，第412页。

<sup>②</sup> 洪应明《菜根谭》，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

接下来的日子里，宗助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坐、参禅。他苦思冥想，却不得其解。于是，他想借阅宜道的《碧岩集》，觉得读书“可能是悟道的捷径”，但宜道劝阻说“读书最妨碍修行。”（详见『門』：837）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sup>①</sup>，认为“语言文字对禅而言乃是人为枷锁……执着于语言文字，就是执着于思辨、认识、理性、推理、分析，这对‘未来境界’的把握而言，乃是南辕北辙”<sup>②</sup>；而师僧给出话头，即禅门的提公案、参话头，是为了引导参禅者以形象、直觉的方式体悟禅境。但宗助理解不了，宜道只得略微让步，对宗助说“如果你一定要读点书的话，《禅关策进》这类能鼓舞和激励勇气的书比较合适。不过，这也只是为了激发而读，与道本身无关。”（『門』：837）

《禅关策进》是云栖寺高僧祿宏辑录的参禅指南。祿宏世称云栖大师或莲池大师，是明代四高僧之一。书中列举了高僧大德的参禅法，分前后两集。前集又分“诸祖法语节要第一”和“诸祖苦功节略第二”两部分；后集为“诸经引证节略”，辑录散见于诸经中的修行要略。全书言简意赅，是开示参禅法的宝贵资料，如赵州谄禅师示众曰“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永明寿禅师垂诫曰“学道之门，别无奇特。只要洗涤根尘下……假使参而未彻，学而未成，历在耳根，永为道种”，太虚禅师示众曰“如未了悟，须向蒲团上冷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个父母未生前面目”，“衣不解带”条载曰“金光照禅师，十三出家，十九入洪阳山，依迦叶和尚。服勤三载，衣不解带，寝不沾席”。<sup>③</sup>

禅宗有顿悟与渐悟之分，但一般人大多是渐悟根器，《禅关策进》亦反复强调了“苦功”的重要性。夏目漱石曾在27岁时在镰仓圆觉寺塔头归源院释宗演（1860—1919）门下参禅，可以说宗助的参禅体验中包含了作家自身的感受，《门》中的相关描述亦显示出作家丰富的禅学修养，这是夏目漱石通过参禅方式寻求救赎路径的重要原因。作品第二十部分赞叹宜道“根器非同寻常，修行也已入佳境”，“他负责管理此庵已两年了，还不曾正式铺了床、舒舒服服地伸直腿睡过一觉。即便冬天，也仅仅和衣靠墙坐着入睡”（『門』：845—846），与《禅关策进》“衣不解带”条所言“苦功”一致。《门》的题名普遍

① 雪窦重显、圆悟克勤《碧岩录》，东方出版社，2017年，第2页。

② 张耀南《〈碧岩录〉与中国文化之转型》，收入雪窦重显、圆悟克勤《碧岩录》，第4—5页。

③ 祿宏《禅关策进》，河北赵县赵州柏林禅寺印行，2015年，第2—3、20、30页。

被认为受到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启发<sup>①</sup>，但《禅关策进》所录永明寿禅师的开示语“学道之门”云云，亦颇契合作品旨趣，而师僧给出的“父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的话头亦见于上述《禅关策进》太虚禅师的开示语中。

再看宜道为何不推荐《碧岩集》呢？《碧岩集》亦称《碧岩录》，是宋代圆悟克勤（1063—1135）对雪窦重显（980—1052）《颂古百则》中的百则公案加以阐释、评说，并由门人编集而成的一本书，被誉为“宗门第一书”，几乎与六祖《坛经》比肩，对日本临济宗影响深远。张耀南指出“《碧岩录》乃是中国文化的转折点”，主要体现在“它从根本上强化、确立了中国哲学批评的‘佛禅格式’”，表现在：（一）开“茶禅一味”之源，（二）开“诗禅一味”之源，（三）开“字禅一味”之源，（四）开“教禅一味”与“禅禅一味”之源，（五）开“儒禅一味”之源。<sup>②</sup>可见该书具有的厚重文化底蕴并不适合初机者阅读，会妨碍初机者以形象、直觉的方式体悟禅境，且洋洋洒洒数十万字，远不如《禅关策进》之类的小册子简明易懂。所以禅门俊才宜道连烧火做饭时都不忘捧着《碧岩集》，却并不推荐宗助阅读该书。当然，这亦是夏目漱石本人在圆觉寺参禅时的真实体验<sup>③</sup>。

《门》第二十部分提及师僧上课时所用的《宗门无尽灯论》，宜道告诉宗助“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白隐和尚的弟子东岭和尚所编，主要讲修禅者如何由浅入深的途径，以及随之产生的心境变化，写得条理清晰”（『門』：849）。白隐和尚即白隐慧鹤（1685—1768），“因偶读明朝袞宏《禅关策进》很受启发”<sup>④</sup>，便根据自己的修行经验和三教一致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习禅方法，简化了公案，重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法，弟子甚众。后世日本临济宗的主流均可追溯到白隐慧鹤，他被誉为日本临济宗的中兴之祖。东岭和尚即东岭圆慈（1721—1792），是白隐慧鹤最著名的弟子之一。他在28岁时用汉文写成《宗门无尽灯论》，现收录于《大正藏》第81册。据《宗门无尽灯论序》记载，东岭圆慈曾经“只为不顾身命用心过度，五脏齐劳大感病患”，乃至于“命不可过三五年之

① 详见桥元志保「夏目漱石『門』を読む ニーチ哲学の受容を視座として」，载『教養・文化論集』2008年2月号，第105—118页。

② 详见张耀南《〈碧岩录〉与中国文化之转型》，第2页。

③ 夏目漱石提到，他在参禅时与一名叫宗活的僧侣成了朋友。某日，他见宗活一边烧炉火一边捧一本书看，便问是什么书，宗活说“《碧岩集》，但书不能多看，再多看也只能领悟到自己修行的程度。”夏目漱石说“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详见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十六卷『談話・色氣を去れよ』，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第683页）

④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4页。

间，于是思惟，我命不足惜，只恨未果自利利他之素愿，却虚修前艰苦。终拟肇法师之临刑著论，竟述此论。日夜打坐蒲团，傍置笔砚，随得随笔。仅三十日而成草稿，名之曰宗门无尽灯论。盖取一灯分百千灯，灯灯无尽之义也”。<sup>①</sup>东岭圆慈因该书稿而受到白隐慧鹤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灯”的寓意。禅宗有“灯录”或“传灯录”，是记载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著作，如北宋的《景德传灯录》即其代表作之一。这是以“灯”喻“法”，以法传人，故名“传灯”，寓意法脉灯火相传。《维摩诘经·菩萨品》亦云“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sup>②</sup>东岭圆慈所谓“灯灯无尽之义”的“无尽灯”与中国“灯录”或“传灯录”的“灯”的内涵一脉相承，与《维摩诘经·菩萨品》所言“譬如一灯燃百千灯”的“无尽灯”亦完全一致。

夏目漱石借宜道之口称赞《宗门无尽灯论》是“一本难得的好书”，而他在描写宜道的参禅造诣时写道“见性之日，他喜不自胜，奔至后山，大声喊道‘草木国土悉皆成佛。’”（『門』：846）其中“草木国土悉皆成佛”见于《宗门无尽灯论》“宗由第一”之“一佛成道观见法界草木国土悉皆成佛”。不仅如此，煤油灯的“灯光”也是《门》的重要道具，它贯穿始终，象征这对贫寒夫妻恬淡的幸福。第五部分描写宗助夫妇“照例坐在煤油灯下，觉得在这个世上，唯有自己坐着的这块地方是明亮的。而在这明亮的灯影下，宗助只意识到阿米的存在，阿米也只意识到宗助的存在”（『門』：689）。夏目漱石对“灯光”的反复强调，是寓意通过佛法令“冥者皆明，明终不尽”，也即通过佛法度化无数众生，令之破迷开悟，明心见性，而这亦是参禅抑或佛家救赎路径的终极指向。

返回东京的日子到了，宗助依然不得要领，他“分明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来浪费时间，觉得宜道的安抚之言，正是因为自己的窝囊，令他深感羞愧”（『門』：852）。学界根据宗助的这一自我评价，均认为其参禅失败，如松尾直昭指出“其分别心关闭了救赎之门”<sup>③</sup>；然而，佛教五戒十善规定不妄言不绮语，宜道的安抚之言并非徒为安慰的不实之语，如作品第二十部分所言“你无须患得患失。坐十分钟，肯定有十分钟的功德；坐二十分钟，肯定有二十分钟的功德”（『門』：847），临别时亦言“你经过短期坐禅，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你特意来这

① 详见『大正新脩大藏经』第八十一卷续诸宗部十二，东京：大正新脩大藏经刊行会，1967年，第581页。

② 《维摩诘经今译》，鸠摩罗什译，道生等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③ 松尾直昭「夏目漱石『門』論 参禅の意味をめぐる」，载『日本文学研究』1990年1月号，第49页。

里，还是值得的”（『門』：852）。事实上，宗助从山寺回到家中，不久便迎来了难得的“小康”日子，不仅避免了被裁员的厄运，还有幸获得了加薪；小六亦成为坂井的书僮而搬到坂井家住，苦恼已久的学费问题有望获得解决。

如上所述，夏目漱石曾于1894年12月到圆觉寺参禅，当时他已开始教书工作。关于参禅原因，他在同年9月4日致正冈子规的书简中写道“这三四年以来，为了冷却沸腾的脑浆，遂振作了学习之心。”<sup>①</sup>“沸腾的脑浆”形象地解释了夏目漱石当时焦躁不安的精神状态，而参禅无疑对其具有救赎疗愈之用。但夏目漱石此前已对佛教显示了浓厚的兴趣。在1890年8月致正冈子规的书简中，他引《华严经》忏悔偈写道“你近来常拿出些偈来，所以我也呈上一偈，请你每天早上焚香诵此偈‘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以驱心魔。”<sup>②</sup>所谓“偈”，即佛经中的唱颂词，夏目漱石所引《华严经》中的此偈是佛教著名偈诵之一。另外，他在1915年2月13日致西川源兵卫的书简中写道“纸收到了……我想抄写《心经》送给您”，同年8月2日的书简中又写道“我用您送的纸抄写了《心经》，三页纸就抄完了。”<sup>③</sup>所谓《心经》，即《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为《般若心经》或《心经》，全文260字，是大乘佛教中最广为人知的经典。“抄经”与“参禅”一样，都是自古流传的佛家修心法门，可见夏目漱石对佛教的兴趣始终如一，且在参禅、抄经等方面积累了诸多实践经验，对佛经亦相当熟悉。佛教注重内心，而非外求，夏目漱石通过佛教寻求或探索救赎之路，无疑与其心性、学养背景有关。同时，正如他在《门》中嵌入的伊藤博文被刺事件所显示的，这一向内救赎之路亦是对当时日本贪得无厌的“对外”殖民扩张政策的一种反拨。

1902年1月30日，日本针对俄国签订《日英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英双方承认彼此有权干预中朝内政和在中朝两国的“特殊利益”。山内昌之指出：“日英同盟使日本拥有了名副其实的帝国意识。支撑这种意识的要素是与民族、人种歧视和大国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自负心理，这从日俄战争胜利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可知。”<sup>④</sup>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已基本具备了“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但还有其独特的特点，即“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

①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十四卷『書簡集』，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第61頁。

②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十四卷『書簡集』，第23頁。

③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十五卷『続書簡集』，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第439、488頁。

④ 山内昌之『帝国と国民』，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第100頁。



就具有军国主义色彩……在连续不断的对外侵略中得到继续发展”（详见《日》：255）。针对帝国时代的“外向”及“扩张”性，禅宗的“内向”智慧确实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反向价值观，这亦是夏目漱石心中救赎力量的源泉。

关于《门》的“救赎”指向，从宜道对宗助引《孟子·离娄上》之“道在迩而求诸远”中关于“道”的明示（详见『門』：852）便可知，亦可从宗助离开山寺之际，对求道之“门”的诸多感慨可知。<sup>①</sup>此外，需要向宗教力量“求助”的宗助以及“道业”有成的宜道的名字亦是明证。夏目漱石主要从《论语》、《菜根谭》、《碧岩录》等中国传统儒释道经典中寻求救赎之路，尤其对超越生死轮回的禅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与其禅学造诣有关，亦与中国禅文化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宗助的参禅还是卓有成效的，虽然并未彻悟，可还是迎来了实实在在的“小康”日子。但当阿米在作品结尾处赞叹春天的来临时，宗助泼冷水道“不过，马上又是冬天了。”（『門』：864）这也是学者们诟病宗助参禅失败之处。然而，正如房东对重返东京的宗助所说的“青蛙夫妇”故事象征的，在追求殖民扩张的帝国时代，一切都处于“弱肉强食”的法则下，“过路的小孩子和闲人抛掷石块，无情地击杀”水沟里“成百成千对”青蛙夫妇，“真是死尸累累啊。这些都是夫妇，确实太悲惨了”（『門』：852）。这种“无情”的屠杀与禅宗主张的慈悲、平等心背道而驰，与前述《宗门无尽灯论》序言中提及的“自利利他”的理念亦南辕北辙，这是救赎之难的真正原因。<sup>②</sup>

【作者简介】邱雅芬，女，1967年生，日本福冈大学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日本明治文学与老庄思想》（载《学术研究》2018年第10期）、《日本的五台山信仰研究》（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年第3期）、《论日本当代先锋戏剧》（载《戏剧艺术》2018年第2期）、《日本先锋文学初探》（载《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4期）等。

责任编辑：严蓓雯

<sup>①</sup> 宗助离开山门时感叹道“自己是来请人开门的，但看门人在门的另一侧，竟连面也不露一下……他是不能通过这门的人，又是必须通过这门的人。总之，他是一个只能站在门下等待日暮降临的不幸者”（『門』：853-854）

<sup>②</sup> 夏目漱石虽然在《门》中寄予了救赎的希望，但正如作品结尾所显示，他也深知救赎之难。在其后的代表作《心》中，他为主人公预留的便是自杀的结局。